1.4.4 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

和本章所评述的日本汉诗史著作不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一书的视角更为微观。作者考察的是近世日本汉诗史的发展动力。如前所述，近世是日本汉诗史的高峰。因此，近世日本汉诗史既是日本汉诗史整体的一部分，其演进符合日本汉诗史整体的趋势，同时，它又有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特色。

从近世日本汉诗史与日本汉诗史整体之关联来看，作者的书写关注到了江户时期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的变化。从江户初期的儒者，到繁荣期以大阪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的町人阶层，近世日本汉诗的发展是以创作活动的大众化为线索进行的。可以认为，大众化的汉诗创作从整体上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多样性。相对地，作者也关注到町人文化对于汉诗诗风的负面影响。享乐和拜金的文化氛围对日本汉诗的精神产生了伤害（385）。

以上，是作者以江户时代汉诗人身份的扩大为线索，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作出的阐释。而同时，作者从“诗坛领袖-诗社争鸣-诗人活动”三位一体的关系出发，更深入地探讨了江户汉诗各个阶段诗学转向的动力所在。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诗坛领袖对某个诗风的倡导引领了同时段诗坛的风尚；而以诗坛领袖为中心组织的诗社之间产生的诗学争鸣，在推动了日本汉诗学论述走向成熟的同时，争鸣的结果也决定了当时诗风的走向；而汉诗团体中诗人个体在各地的活动，也扩散了某个诗风的影响。

具体来说，从诗坛领袖的影响来说，木下顺庵引领了江户初期的尊唐诗风，其弟子对其师门诗风的倡导进一步推动了当时汉诗的发展与创新。而此后，山本北山提倡性灵论，则是对此前尊唐诗风下，泥古模拟风气的反拨。

到这一阶段，以江湖社为代表的诗社活动，推动了近世日本诗风向性灵诗学的转向。而江湖社诗人的游历也对性灵诗学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88）。而诗社活动的影响力，除了诗社成员对汉诗创作、诗学理念探讨的热情以外，其根本因素在于诗社开创者对新诗风的推动。因此，可以认为，诗坛领袖、诗社活动和诗人个体的活动对于本书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动力书写来说，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因素。

至于作者所言近世日本汉诗的折衷期，广濑淡窗、广濑旭庄、梁川星岩这三位诗人被尤其突出。依作者所言，这三人“对江户后期诗坛的诗风诗论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加之他们门下弟子众多,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折衷融合的诗作法成为江户后期诗坛的主流。”（430）由此可见，在本书对近世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中，诗坛领袖，抑或典范诗人的树立，是一条不变的主线。